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 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 (1978 - 1996)*

吴愈晓

提要: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

关键词:体制转型 精英家庭背景 职业流动 中国农村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关于这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国内外社会学界

* 本文曾在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西安,7月20-22日)“社会分层与流动”分论坛作报告。本研究得到山东大学“985”工程第二期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的资助。作者感谢北京大学李博柏教授对本研究数据分析方面的指导,并感谢北京大学杨善华教授和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分论坛一些同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其一是制度主义分析视角,关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对社会分层和流动模式的影响,其代表是倪志伟(Nee, 1989a)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转型使权力从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转移,并为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激励(具体体现为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另一方面,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市场实现经济上的成功,走向社会上层;而相对于新生的经济精英,权力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基于相反的经验结果提出了反对的理论观点,如“权力继续论”(Bian & Logan, 1996)、“权力转换论”(Róna - Tas, 1994)以及“政治和市场共进论”(Zhou, 2000),这些观点都强调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因素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①

另一种研究视角可被称为结构主义分析视角,主要关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分层造成的影响。魏昂德(Walder, 1996)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制度变革(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转型”理论争论过于关注制度变迁,从而忽略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显示,19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工薪职业种类和自雇经营的机会,而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Oi, 1989; Walder, 2002a)。戈伯和豪特(Gerber & Hout, 1998)的研究也表明,苏联解体之后,休克疗法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急速变化,促使人们就业模式转型,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

但是,无论是制度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分析视角,都体现了较强的结构主义取向。亦即是说,在这两种范式中,个人完全是被动的,其行为或命运的选择完全由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形塑或决定。然而这种强烈的理论预设是违背社会现实的,因为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是能主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制度或结构变化的。因此,在社会研究中,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Blau, 1977; Blalock, 1991)。近年来,研

①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争论,请参考边燕杰主编 2002 和刘欣 2003。

究转型社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宏观层次的制度或结构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模式变化间的中间过程。在经验上,这种研究旨趣主要体现为关注在新的机会结构下,劳动力向新兴市场部门的转移或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精英群体)之间的流动,以及这些过程对个人不平等模式的影响(Wu & Xie, 2003; Walder 2002b 2003; 吴晓刚 2006 2008)。吴晓刚(2006)将这种研究视角定义为“机会—流动论”视角。简单说来,这种研究视角将社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着重强调“在转型经济中,个体怎样通过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

“机会—流动论”视角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这一视角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此视角虽然关注个人在机会结构变化时的行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机制,但是在理论解释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突破“市场转型理论”中的“权力和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即在解释变量方面仍然主要关注再分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如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全方位的,因此,对权力和市场因素的过度关注将忽视其他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探讨转型期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时候,大多数研究都只关心代内流动,特别是从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到转型期的企业家精英的流动,从而忽略了经典的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代际流动,即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

本文将沿用机会—流动论的研究视角,即关注中国农村居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如何积极应对因市场化或工业化造成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并进入农村社会上层的过程。但是在分析策略上,本文将尝试突破已有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我强调代际流动,关注祖父或父辈在改革前甚至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改革后其子或孙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其次,在理论解释方面,我将突破“权力与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引入一个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文化因素。具体说来,我将检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文化——旧式精英文化(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精英)和新式精英文化(1949年至1978年再分配体制中的农村精英)——对改革后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这种研究策略不仅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还有两个长处:一是可衔接市场转型研究与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

动研究范式,从而将关注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传统中进行讨论;二是可以将本研究置于一个更久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同时考察中国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最重大的社会变革(40 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当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

二、市场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流动

关于转型社会精英流动的系统分析始于撒列尼对匈牙利家庭农场研究(Szelényi, 1988)。撒列尼发现匈牙利 20 世纪 70 年代市场化改革后,从事私有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上成功的,是在 40 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拥有土地但被社会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裔,而不是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干部阶层。基于此,他认为改革后新兴的经济精英阶层来自社会的下层,特别是那些被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精英地位的群体。撒列尼进而提出了“被中断的资产阶级道路”(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化阶段是对原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断,而市场化改革则使匈牙利社会恢复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历史轨迹上来(Szelényi, 1988)。

倪志伟(Nee, 1989a)借鉴了撒列尼的理论,并在对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市场权力、市场激励和市场机会——组成。其中市场机会命题体现了倪志伟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即市场转型带来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开辟了不受再分配权力控制的新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通过市场成为经济精英,走向社会上层(Nee, 1989a: 667)。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里,倪志伟(Nee, 1989b)进一步指出农民企业家阶层构成了中国农村中的一股新的势力,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同时分析了改革后中国农民企业家的来源,发现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主要来自农村中具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如留守知青(高教育程度)或复员军人(在军队里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以及原来再分配经济时期的生产队干部(但在倪志伟的解释框架里,这些生产队干部成为企业家并不是利用他们的再分配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比较系统地反对倪志伟观点的是罗纳塔斯(Róna - Tas, 1994)的

“权力转换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前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转型后这些干部失去了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积累的这些社会资源仍然存留着,因而在私有化过程中,这些原来的权力精英可以借助这些社会资源将公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成为资本家(Róna - Tas, 1994)。简单说来,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转换成了经济权力,转型前的权力精英变成了转型后的经济精英。

宋时歌(1998)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呼应了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论”,认为转型期间原来的权力精英确实更可能转换为农民企业家,并从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不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革的后期。基于此,他提出了“干部权力的延迟效应”的观点,认为改革的早期,由于干部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使之缺乏转向市场的激励,因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干部权力真空,这使得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成员有机会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市场中的巨大经济利益吸引了许多干部,使他们逐渐成为农村企业家的一个主要来源。

但是,最近的几项研究并不支持宋时歌的观点。魏昂德(Walder, 2002b)的研究发现干部和非干部在成为农民企业家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他的解释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干部职业有了较大的经济回报,而经营私营企业要冒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缺乏转换的动机。吴晓刚(2006)的研究亦发现,在中国农村,干部转换成企业家的机率与非干部相比总体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如果考虑时间的因素,其结论刚好与宋时歌(1998)的发现相反,即:改革初期,干部成为农村企业家的可能性最大,但从1978年开始,干部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迅速下降。

由此看来,已有的文献关于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来源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在理论解释上过于强调“权力—市场”的关系,同时在经验上过多专注于“干部—企业家”的流动。具体地说,在探讨转型期地位获得或职业流动的时候,大多数已有的研究仅仅将“农民企业家”作为农村中的新经济精英,并集中讨论再分配权力对进入这个新经济精英阶层中的作用(如 Nee, 1991; 宋时歌, 1998; Walder 2002b; 吴晓刚 2006)。但事实证明,私营企业主并不是市场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惟一的受益者,除他们外,农村中仍有通

过其他途径实现经济上的成功的阶层或职业群体。例如,由于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村中的公共部门兴起,产生了许多工薪就业的机会,并形成了一个经济回报较高的“工资劳动者”阶层(Walder 2002a)。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政治精英可以不通过从事私营企业获取较高的经济回报。总而言之,已有研究无论在解释框架还是目标主体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多方位的社会变迁。

本研究试图引入文化因素,以求突破上述研究之局限,深化对中国市场转型中农村精英代际传承的认识。我认为,文化是制度和结构因素之外影响个人生活机会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微观的社会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献中,文化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确切地说,本文将检验家庭的精英文化传统(或文化资本)对改革后农村地区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关于农村中的精英群体,本文不仅仅指私营企业主,同时也包括农村中其他经济回报较高的职业群体如工资劳动者和农村干部。

三、社会变革与精英的代际传承:一个文化的视角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首先是4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解放后近30年的共产主义试验,可以说颠覆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土地改革以后,传统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阶层(如地主、乡绅或地方官员等)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变成了社会底层,取代他们精英位置的是一个有“红色背景”(如党员、革命战争中的功臣或烈士的家属,以及其他政治上的忠诚者)的新精英群体。这种新的阶级构成被后来一系列社会运动如“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另外,在人民公社时期,所有个体或私有的经济活动被全面禁止或被迫转入地下,传统社会的自雇或企业主阶层被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实体中的农民。

第二次社会变革就是当前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农村,这场改革使得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并迅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开始了一个“去集体化”的社会进程。随之,原来被禁止的个体或私有的经营行为被解禁而且被鼓

励,各种再分配经济下的体制壁垒也逐渐解体。伴随着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改革后的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新形成的社会结构与解放前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会不会有关联?当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标签被摘掉,而且面临着新的机会结构的时候,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或他们的后代会不会复兴?

在对市场转型后匈牙利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撒列尼提出了“被中断的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将匈牙利的市场化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复兴。具体地说,在匈牙利1948 - 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匈牙利就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这种进程被共产主义革命中断了,而市场化改革之后,匈牙利又回到了革命前的社会轨迹上来。撒列尼提出这个理论的经验依据是他发现,市场转型之后从事私有农场并取得成功的大多来自共产主义革命前的私营企业主或他们的后代(Szelényi,1988)。为解释这一现象,撒列尼提倡韦伯式的文化理论视角,并借用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当私有财产被剥夺和私有经济活动被禁止的时候,文化资本代替物质资本成为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的中间纽带或作用机制。

撒列尼的理论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用来理解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中国的情形与撒列尼的理论所赖以建构的社会剧变的匈牙利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没有经历全面的私有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农村的改革虽然发端于底层农民的英雄壮举,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实现并最终普及仍依靠最高决策层的同意和推广,即中国改革走的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道路,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因此,市场改革后的农村社会与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仍有连续性,而不是撒列尼笔下的匈牙利那样,改革完全颠覆了再分配体制,造成社会断裂。由此看来,撒列尼的理论在宏观的层面上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回复到传统的社会轨迹上。但是,在微观的社会机制方面,他提出来的文化资本的理论解释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机制。文化资本的概念可追溯至韦伯(Weber,1968)关于精英地位文化(elite status culture)的阐述,布迪厄(Bourdieu,1977,1997/1983)将它发展成为一套理论体系。根据布迪厄的解释,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象征符号;个体或群体

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们的社会竞争力越强;由于精英家庭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其成员更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精英等级和统治力;同时,这种文化资本在家庭内进行代际传承,而这正是社会不平等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即文化的再生产。关于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布迪厄认为,精英家庭通过早期社会化等方式,将外在的财富或社会地位转化为家庭成员的内在部分,成为一种惯习。^①另外,文化资本的保存和积累比较顽固,不易受到外在结构和环境的影响(Swartz, 1997; 亦可参看李猛, 1999)。文化资本的理论被一系列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所验证。^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研究发现,由于私有财产被剥夺和物质资本的传承被禁止,文化资本在地位的代际传承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而且文化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也更强(Ganzeboom et al., 1990)。对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在宏观的政治环境剧烈动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丧失的情况下,家庭文化资本也一直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Wu, 2008)。

因此,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逻辑,我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以后,旧式精英或新式精英的后代都更可能成为改革的收益者。他们继承了家庭的精英文化资本,这有助于他们把握新的机会结构,成为改革后的精英阶层。我称这种现象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对于旧式精英家庭而言,他们的精英地位虽然被政治体制剥夺和压制,但是其精英文化仍得以保存。^③而当政治压制和体制枷锁一旦松开,这种精英文化资本将帮助他们的后代迅速抓住新的机会,便利其回到社会的上层。对于新式精英而言,改革前30年的再分配体制也可以让他们形成特定的精英文化,而这种精英文化也会影响其后代在市场化改革后的职业选择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如前所述,改革后中国农村新的精英阶层包括三种收入回报较高的职业群体: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工资劳动者和干部群体。我认为,

① 惯习是布迪厄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可以被看作个人的一种特性或倾向,通过它,外部的环境(经济或社会地位等)被内化并转化为个体的抱负(aspiration)和期望(expectation)(参见 Swartz, 1997)。

② 关于对这些研究的述评,请参看 Lareau & Weininger 2003。

③ 这个观点是可以被一些定性研究的发现支持的。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再分配体制下,浙江一些地区的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非农经营的传统一直未能被人民公社制度和国家扼杀,而以地下的形式存在(张乐天, 1998; 蒋勤, 2006)。

不论是旧式精英还是新式精英的后代,他们进入这些精英职业类别的机率都比没有任何精英背景的人要高;但是,由于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的构成完全不同,因而其各自秉持的精英文化也不同,缘此,改革后他们获得精英地位的路径便各有差别。首先,由于中国改革后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新式精英家庭在再分配时期积累的“政治或权力文化”,将有助于其后代在改革后顺利进入村干部职业或在乡镇企业,以及村庄的公共部门获得工薪职业的位置。另外,由于再分配经济时期私有和个体经营方式是被禁止的,因此新式精英家庭缺乏“个体经营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缺失将不利于其后代在改革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自雇职业类型。对于旧式精英家庭的后代而言,同样是因为改革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由于其缺乏政治资本因此不太可能进入农村政治权力的中心,即其获得村干部职业的机会并不大,因此他们要获得(或恢复)精英地位将主要通过进入私营企业或工薪职业的途径。基于以上这些讨论,我提出以下研究假设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

假设 1: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或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没有精英背景的人更可能在改革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

假设 2: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没有精英背景的人更可能在改革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但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并非如此。

假设 3: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没有精英背景的人更可能在改革后进入村干部职业类型,但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并没有这种优越性。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1996 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抽样调查(Treiman, 1998)。该调查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中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的 20 - 69 岁的人口中,抽取了 6090 人的随机样本(其中城市的样本量为 3087,农村的样本量为 3003)。该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的信息,而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项调查收集了受访者祖父(和外祖父)、父亲(和岳父)的包

括解放前的历史在内的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的信息,这在目前可以获得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中是惟一的。由于本研究关注解放前和解放后(改革前)的家庭背景对改革后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回答本研究问题的最合适的数据资料。^① 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村居民改革后的职业道路选择,因此只选用 3003 个农村个案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是研究 1978 至 1996 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精英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这里所说的精英职业,是相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普通农民而言,主要指农村中经济回报较高的职业。以往的研究表明,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收入占优势的群体包括在乡镇企业或公共部门上班的工资劳动者、自己创业的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者,以及拥有行政权力的农村干部(Nee, 1989a, 1996; Oi, 1989; Walder, 2002a, 2002b, 2003)。因此,本研究的精英职业包括三个类型:(1)非农业工资劳动者,指所有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工作并领取工资的人,如工厂工人、汽车司机、销售人员、学校教师,以及集体或私营企业里的管理人员,等等;(2)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自雇人士);(3)农村干部。

表 1 报告了 1996 年中国农村地区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家庭年收入情况。很明显,工资劳动者、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以及农村干部的平均年收入(或中位数)明显高于普通农户(平均年收入为 6454 元),其中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的平均年收入最高,为 12301 元,几乎为普通农民家庭收入的两倍,接下来是农村干部和工资劳动者家庭(分别是 10870 元和 10273 元)。这些数据显示,本研究将这三类职业作为农村中的精英职业类型是有充分的经验依据的。

为了检验改革后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不同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本研究使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有效地处理时变变量(time-varying covariates)和数据的截删(censored cases)问题(Allison, 1984; Blossfeld & Rohwer 2002)。具体的统计分析模型是离散时间风

① 不可否认,本研究所用的数据资料略为陈旧,因为 1996 年(本数据收集的时间)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它是目前惟一的一个能提供本研究所需要的关于受访者祖父(外祖父)辈和父(岳父)辈详细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等重要信息的数据库。另外,如前所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渐进的、连续的,因此,分析本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仍有基本的意义。

险模型(discrete time hazard model) ①该模型的方程是:

$$\log\left(\frac{p(t)}{1-p(t)}\right) = \delta(t) + b_1x_1 + b_2x_2 + \dots + b_kx_k$$

表1 中国农村不同职业类型个人的家庭年收入情况(1996年)

职业类型	年收入均值(元)	年收入中位数(元)	样本数
工资劳动者	10273	7000	437
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	12301	9000	222
乡村干部	10870	7480	64
普通农民	6454	4500	2269
总样本	7540	5000	2992

在上面的方程中, $\log\left(\frac{p(t)}{1-p(t)}\right)$ 是指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而言, 事件(这里指的是进入某种类型的精英职业)在 t 时间点发生的机率(odds)的自然对数形式。 $x_1 \dots x_k$ 是指所有的解释变量。除了那些不会随时间而变化的特征(如性别)之外, 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时变变量。 $b_1 \dots b_k$ 则是指每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delta(t)$ 是一个时间函数, 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定义。如果它被指定为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模型就等同于常见的事件史指数模型(exponential model); 如果它被定义为虚拟变量以测量不同的时间段, 那么这个模型就等同于考克斯模型(Cox model); 它也可以定义为不同的时间函数形式(如 Gompertz, Weibull 函数等等)。因此,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模型设定, 而且特别适合当时间间距较大(如本研究是以年为单位)的情况。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的估计结果与许多连续时间模型(continuous-time models)非常接近(Allison, 1982)。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时间函数 $\delta(t)$ 定义为一个常数。

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框架下, 分析单位不再是简单的个体, 而是某一特定时间(这里是以年为单位)里的事件(进入特定的精英职业类型)。在本研究中, 模型的初始时间被设定为 1978 年(那些在 1978 年尚未开始工作的个案, 初始时间则设定为他们开始工作的年份), 直至

① 这种模型在有的文章中亦被称作离散风险模型(见吴晓刚, 2006)。

1996年仍未进入特定职业类型的个案则被右截删(right-censored)。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不同历史时期——解放前(1949年之前)以及解放后改革前(1949-1977年)——的家庭背景(文化)对受访者改革后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家庭背景。该变量根据受访者的祖父、外祖父、父亲或岳父在这两个时期阶段的职业类型来测量。如果受访者的这些家庭成员中有人曾经是解放前的政治精英(包括地主、乡绅,以及国民党的官员等)或经济精英(包括私营企业主或自雇职业者等),那么我们称该受访者具有旧式的精英家庭背景;如果受访者的以上家庭成员在1949-1977年间曾经是政治精英(党员或村干部)或经济精英(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我们称该受访者具有新式的精英家庭背景;那些既没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又没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受访者,则是非精英家庭背景。因此,在数据分析中,家庭背景这个变量是一个包括三类的类别变量(1 = 旧式精英背景 2 = 新式精英背景 3 = 非精英背景),其中非精英背景是参照类。^①

控制变量包括两组,一组是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党员。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 = 1)。年龄是一个时变变量,根据风险年(即进入目标职业类型的年份)与受访者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值来测量。模型中同时加入年龄的平方项,以检验年龄的非线性效应。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决定地位获得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本研究用一个虚拟变量来测量受访者的教育程度(高中或以上 = 1 高中以下 = 0)。党员是一个虚拟变量(是 = 1),代表了个人的政治身份及其拥有的政治资本。教育和党员也都是时变变量,表示在风险年之前的个人特征。第二组控制变量是地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所在村庄的人均耕地数(自然对数)、村庄与省城的距离(自然对数),以及区域虚拟变量(东部 = 1,中部和西部 = 0)。村庄的人均耕地通常跟村庄的非农经济有关系,人

①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农村,新、旧精英群体的构成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新精英的地位是从旧精英手中夺取而来的,而旧式精英则变成农村中的最下层(“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成分划分中的“坏”)或普通农民。因此,很少会出现受访者同时具有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的情况。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只有极少数的个案是这种情况,而且在分析的时候无论将他们归为任何一种精英背景类型都不会影响结果。为了研究的方便,我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将这些极个别的案例排除在分析样本之外。

均耕地越多的村庄,村民的生存压力较低,因而从事非农业经济的动机和激励会较弱。与大城市之间的距离也是一个影响非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离城市中心越近,非农经济发展的机会就会越多。另外,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东部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最发达,中部次之,西部最不发达,因此,为了估计农村居民进入非农职业的效应,需要对不同的区域进行统计控制。

五、结果分析

在这部分,我通过事件史分析法和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地区1978年至1996年间进入工薪职业、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以及农村干部三种职业类型的影响因素,并主要关注两种精英(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对不同的目标职业类别,我单独建立模型分别进行统计估计。如前所述,数据分析的目的不仅仅要验证进入某一目标职业受到某些特定自变量的影响,而且要检验这些自变量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为实现这个目的,我的分析策略是首先建立一个模型估计1978到1996年整个历史阶段的职业转换模式,然后将时间(风险年)分成两个阶段:改革的早期阶段(1978 - 1986年)和后期阶段(1987 - 1996年),并分别建模进行估计。因此,在每一个单独的分析中,我都估计三组模型,一组是不分时间的模型(总体样本模型),第二组是改革早期阶段的模型,而第三组是改革后期阶段的模型。每一组我估计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基准模型,只估计控制变量的效应,第二个模型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以验证家庭背景的净效应。所有模型都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差(robust standard errors),以校正抽样可能带来的偏差。

(一) 进入工薪职业类型

图1显示了1978至1996年间不同家庭背景的样本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风险率(hazard rates)。总体而言,在整个考察的时间段(1978 - 1996年),有精英家庭背景(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精英背景)的人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风险率都比非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要高,表明家庭背景确实对改革后的非农职业流动有影响。如果看分历史阶段的情况,我

们得到更加有趣的发现:在改革的早期(1978 - 1986 年间),精英家庭背景的作用尤其明显,而且呈上升趋势;另外,不同精英背景的作用并不相同,有新式精英背景的个人进入工薪职业的比旧式精英家庭背景明显要高。但在改革后期(1987 - 1996 年),精英家庭背景的作用呈下降趋势,而且新、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作用趋同(两根线基本重合)。这表明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确实随时间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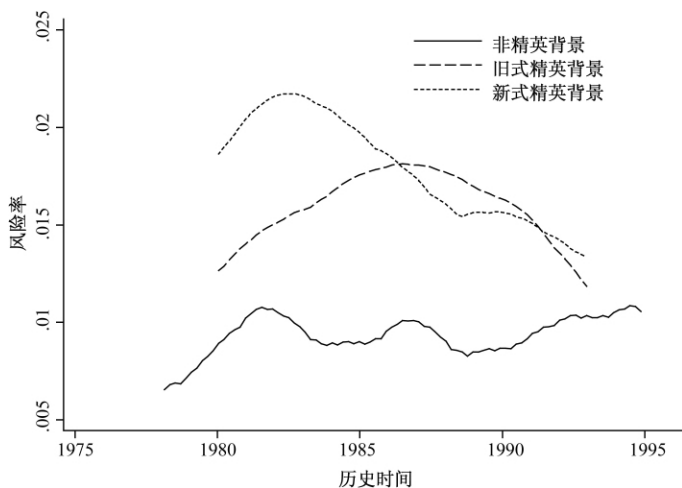


图1 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风险率(1978 - 1996)

表2 报告了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进入工薪职业的回归系数。第一组模型(模型1a和1b)反映的是不分历史阶段的情形,但加入一个时间虚拟变量(改革的早期阶段即1978 - 1986年 = 1)作为控制。其中模型1a是基准模型,只估计控制变量的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进入工薪职业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男性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是女性的2.15倍($= e^{0.767}$,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年龄的效应是一个正U型的曲线,表明开始时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到达某个最低点(这里计算得到的是大约47岁)之后,其风险率开始随年龄而递增。这种现象大致可以理解为新生的劳动力有更强的意愿从事非农工薪职业,而且他们教育程度较高,往往更可能被农村中的乡镇或私营企业雇用;而对于年长者,由于其有更丰富的经验或阅历,因此也更可能受雇于公共部门或企业。教育的

正面效应十分明显,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有高中或以上学历的人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是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的 3.41 倍 ($= e^{1.228}$, 在 0.001 的水平显著)。党员的效应不显著,表明政治身份对进入工薪职业并没有帮助。地区特征变量对进入工薪职业的作用也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与我的预期一致,人均耕地数越多的村庄,村民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越低;与省城距离越远,进入工薪职业的可能性也越小;另外,东部地区的农民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民。这些地区特征变量的效应表明,个体的非农职业获得是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村庄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

模型 1b 在 1a 的基础上加入了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精英家庭背景变量。可以发现,旧式精英家庭背景和新式精英家庭背景这两个虚拟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有精英家庭背景(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的人更可能进入工薪职业,这与图 1 描述的模式是一致的。具体说来,有旧式精英背景的人进入工薪职业的净风险率比没有精英家庭背景的人高出将近 43% ($= e^{0.360} - 1$, 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工薪职业的净风险率更高,相当于没有精英家庭背景的人的 2.01 倍 ($= e^{0.696}$, 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 1,即无论是旧式精英还是新式精英的后代改革后都更可能成为工资劳动者(见表 2)。

表 2 的第二组模型(模型 2a 和 2b)与第三组模型(模型 3a 和 3b)反映的是改革后不同的历史阶段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模式。模型 2a 和 2b 所显示的模式与模型 1a 和 1b 里的模式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亦即是说,在改革的早期阶段(1978 - 1986 年),有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更可能抓住机会离开土地进入工薪职业:与没有精英背景的人相比,旧式精英的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高出约 86% ($= e^{0.618} - 1$, 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新式精英的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更高,高出约 118% ($= e^{0.778} - 1$, 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3a 显示的模式与 2a 的模式是相同的,表明所有的控制变量的效应并不随历史时间而变化。但是,对比模型 3b 和 2b,我们发现改革后 10 年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与改革前 10 年相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首先,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没有了统计显著性,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式精英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的优势逐渐消失;其次,虽然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仍然显著,但是其大小(magnitude)与改革前 10 年相比也下降了(风险系数

表 2 对中国农村地区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离散
时间风险模型估计 (1978 - 1996)

变量	整个改革时期 (1978 - 1996 年)		改革前 10 年 (1978 - 1986 年)		改革后 10 年 (1987 - 1996 年)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改革的阶段 (1978 - 1986 年 = 1)	-. 558 *** (. 105)	-. 568 *** (. 105)	— —	— —	— —	— —
性别 (男性 = 1)	. 767 *** (. 115)	. 784 *** (. 115)	. 778 *** (. 158)	. 778 *** (. 158)	. 773 *** (. 165)	. 799 *** (. 166)
年龄	-. 377 *** (. 029)	-. 382 *** (. 029)	-. 363 *** (. 045)	-. 368 *** (. 045)	-. 373 *** (. 038)	-. 379 *** (. 039)
年龄平方项	. 004 *** (. 000)	. 004 *** (. 000)	. 004 *** (. 001)	. 004 *** (. 001)	. 004 *** (. 001)	. 004 *** (. 001)
教育程度 (高中或 以上文凭 = 1)	1. 228 *** (. 116)	1. 198 *** (. 116)	1. 526 *** (. 171)	1. 495 *** (. 170)	. 915 *** (. 163)	. 901 *** (. 165)
党员	. 431 (. 319)	. 381 (. 321)	. 659 (. 425)	. 619 (. 435)	. 237 (. 454)	. 179 (. 452)
人均耕地 (自然对数)	-. 281 *** (. 062)	-. 267 *** (. 065)	-. 282 ** (. 091)	-. 261 ** (. 091)	-. 272 *** (. 080)	-. 272 ** (. 084)
与省城的距离 (自然对数)	-. 218* (. 094)	-. 218* (. 094)	-. 224 + (. 131)	-. 231 + (. 130)	-. 216 + (. 129)	-. 219 + (. 130)
地区 (东部 = 1)	. 746 *** (. 114)	. 744 *** (. 114)	. 604 *** (. 156)	. 609 *** (. 156)	. 925 *** (. 157)	. 917 *** (. 157)
旧式精英 家庭背景	—	. 360* (. 181)	—	. 618* (. 242)	—	. 105 (. 262)
新式精英 家庭背景	—	. 696 *** (. 165)	—	. 778 *** (. 217)	—	. 565* (. 247)
常数项	1. 736* (. 683)	1. 783 ** (. 682)	. 866 (. 970)	. 922 (. 965)	1. 830* (. 908)	1. 893* (. 906)
观察值	2779	2779	2493	2493	2457	2457
事件数	429	429	225	225	204	204
卡方值	685. 18	695. 26	370. 91	378. 74	370. 43	373. 26
Pseudo R ²	. 182	. 186	. 194	. 202	. 173	. 175

说明: 括号里的数字是调整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

+ p < 0. 10,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双尾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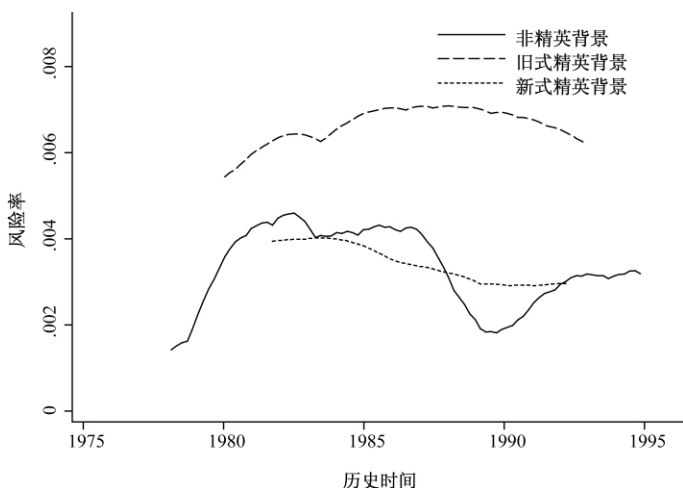


图2 进入私营企业主或自雇职业的风险率(1978 - 1996)

从 0.778 下降为 0.565)。

总结图 1 和表 2 的分析结果,本文发现,旧式和新式精英家庭背景总体都有助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特别是在改革的早期(1978 - 1986 年);在改革的后期(1987 - 1996 年),新式精英家庭的后代仍然更有可能进入工薪职业,但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已经消失。

(二) 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

图 2 描述了改革后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风险率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在考察的整个历史时期(1978 - 1996 年),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个体进入的风险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群体。而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个体与非精英家庭背景的个体的风险率基本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他们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风险率比后者的还要低(虽然这种区别不是很明显)。由此看来,改革后,旧式精英的后代更有可能把握市场机会从事私营经济活动。图 2 反映的模式初步证实了假设 2。

为了严格检验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净效应,我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进行估计。表 3 报告了模型的系数。表 3 中的模型建构步骤与表 2 完全一致,即先估计一个整个历史阶段的模型,然后分成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估计,以检验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

表3 对中国农村地区进入自雇职业类型的离散
时间风险模型估计(1978-1996)

变量	整个改革时期 (1978-1996年)		改革前10年 (1978-1986年)		改革后10年 (1987-1996年)	
	模型4a	模型4b	模型5a	模型5b	模型6a	模型6b
改革的阶段(1978-1986年 = 1)	-.164 (.169)	-.153 (.170)	— —	— —	— —	— —
性别 (男性 = 1)	1.115*** (.186)	1.103*** (.187)	1.234*** (.258)	1.219*** (.260)	.966*** (.275)	.963*** (.274)
年龄	-.171** (.055)	-.170** (.055)	-.183** (.071)	-.183* (.072)	-.142 + (.085)	-.138 (.086)
年龄平方项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教育程度(高中或以上文凭 = 1)	.751*** (.174)	.724*** (.175)	.904*** (.233)	.889*** (.233)	.543* (.266)	.495 + (.265)
党员	-.023 (.542)	-.031 (.543)	.379 (.644)	.394 (.651)	-.671 (1.034)	-.714 (1.020)
人均耕地 (自然对数)	-.418*** (.083)	-.381*** (.087)	-.469*** (.114)	-.445*** (.118)	-.363** (.127)	-.309* (.130)
与省城的距离 (自然对数)	-.321 + (.173)	-.314 + (.172)	-.237 (.244)	-.246 (.242)	-.403 + (.244)	-.377 (.244)
地区(东部 = 1)	.938*** (.180)	.947*** (.182)	1.044*** (.240)	1.045*** (.241)	.807** (.277)	.824** (.279)
旧式精英 家庭背景	— —	.581* (.235)	— —	.524 (.330)	— —	.699* (.335)
新式精英 家庭背景	— —	.174 (.315)	— —	.020 (.435)	— —	.361 (.449)
常数项	-2.585* (1.273)	-2.589* (1.267)	-3.393 + (1.743)	-3.296 + (1.738)	-2.163 (1.812)	-2.301 (1.823)
观察值	2849	2849	2534	2534	2608	2608
事件数	152	152	88	88	64	64
卡方值	217.44	216.55	142.70	143.73	75.80	82.02
Pseudo R ²	.123	.126	.146	.148	.096	.101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是调整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

+ p < 0.10, * p < 0.05, **p < 0.01, ***p < 0.001(双尾检验)。

模式的差异。模型 4a 报告了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量的作用基本都符合预期。首先, 与已有的研究一致(吴晓刚, 2006),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男性进入该职业类型的净风险率是女性的 3 倍 ($= e^{1.115}$, 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年龄的系数是负的并统计上显著, 而且年龄的平方项不显著, 这表明年龄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风险率是反向的线性关系, 即年纪越大进入这类职业的风险率越低。在这里, 年龄的效应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正 U 型模式(表 2 的模型 1a) 并不同, 这可能是因为从事个体或私营企业的风险性更大, 而年龄越大, 承受这种风险的能力和意愿越低。教育对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作用非常显著: 有高中或以上学历的人进入该职业类型的净风险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 2.12 倍 ($= e^{0.751}$, 在 0.001 的水平显著)。党员的效应是负的, 表明党员比非党员更不可能从事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 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统计显著性。另外, 与模型 1a 的模式相似, 地区特征变量对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有显著的影响: 首先, 东部地区的居民比中、西部的更可能进入; 其次, 所在村庄人均耕地越多, 进入的可能性越小; 最后, 离省城的距离越远, 成为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者的风险率越低。

表 3 的模型 4b 显示, 在 1978 至 1996 年间, 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更有可能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控制了所有个人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之后, 旧式精英家庭的后代进入的风险率比没有精英家庭的人高出 79% ($= e^{0.581} - 1$, $p < 0.05$)。但是, 与没有精英家庭的人相比, 新式精英的后代并不更倾向于进入自雇职业类型。虽然回归系数(0.173) 是正的, 但是没有统计显著性。与图 2 反映的模式一致, 这里的结果支持假设 2。

表 3 的第二组模型(模型 5a 和 5b) 与第三组模型(模型 6a 和 6b) 报告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估计系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模型 5a 和 6a 中所有控制变量的作用与模型 4a 反映的基本是一致的, 表明本研究这些因素的作用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若对比家庭精英背景的作用(模型 5b 和 6b), 我们得到了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在改革的前 10 年(1978 - 1986 年), 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明这些新、旧精英的后代在这个阶段都不倾向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在改革的后 10 年(1987 - 1996 年), 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仍然不显著, 但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显著性显现。

亦即是说,在改革的后期,旧式精英的后代更可能从事私营企业或个体职业,他们进入这类职业的净风险率是无精英背景者的2倍左右($= e^{0.699} p < 0.05$)。这种不同精英背景的效应模式,与估计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模式(表2的模型3b)完全不同。具体说来,在改革的后期,新式精英的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类型具有优势,但是旧式精英的后代没有;而对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而言,情况恰好相反,旧式精英的后代具有优势,而新式精英的后代则没有。

因此,对比表2和表3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精英家庭背景对其后代进入非农职业类型都有正面的效应,但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在改革的早期阶段,旧式和新式精英的后代都更加倾向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而在改革的后期,这两种精英的后代在非农化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分野:旧式精英的后代选择了从事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道路,而新式精英的后代仍更愿意从事工薪职业。关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关于从事个体职业或私营企业的政策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私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正式获得合法地位。为了规避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新、旧精英的后代都选择了较为保守的非农化道路——在村庄的公共部门或企业里谋一个职位,赚取工资收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关于自雇经营的政策方针都逐渐明确,为了迅速恢复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旧式精英的后代选择了风险较大但回报更高的路径——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而对于新式精英的后代而言,由于再分配时期私营和个体经济行为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们的家庭缺乏这种个体经营的文化传统,亦即是说他们没有赖以助其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文化资本,因此,他们依旧选择风险较低且回报相对高的工薪职业类型来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三) 进入农村干部职业类型

如前所述,在中国农村,干部也是经济回报较高的一种职业,因此,除了估计决定进入工资劳动者和自雇职业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对不同的精英家庭背景是否对进入干部职业有显著的影响感兴趣。统计分析的策略跟估计前两种职业的一样,但是考虑到地区性特征与个体是否成为村干部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建立模型的简约性原则出发,我将三个地区特征变量(村庄土地数、村庄与省城的距离,以及区

域虚拟变量)排除在外,只保留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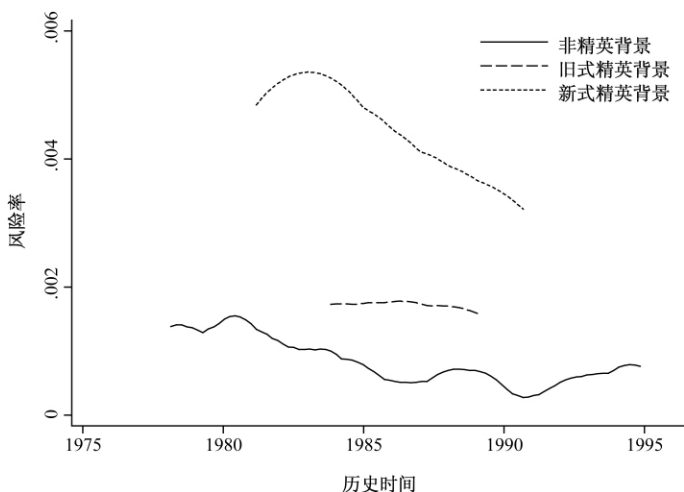


图3 进入乡村干部职业的风险率(1978 - 1996)

图3显示了在1978至1996年间,不同精英家庭背景的后代进入干部职业的风险率。非常明显,在整个考察的时间内,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干部职业风险率远远高于旧式经济背景的人和无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虽然从图3中看,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无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进入的风险率略高,但两者的差别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这验证了假设3。

表4报告了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改革后进入干部职业的回归系数。模型7a显示,在1978至1996年间进入村干部职业的人当中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进入干部职业的净风险率是女性的3.5倍($= e^{1.253}$, $p < 0.01$)。教育的作用也非常显著,有高中或以上学历的人成为乡村干部的净风险率是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的3.26倍($= e^{1.183}$, $p < 0.001$)。另外,亦是意料之中的,党员身份对成为村干部非常重要。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党员进入村干部职业的风险率是非党员的12倍多($= e^{2.495}$, $p < 0.001$)。而年龄对进入干部职业没有

^① 在估计模型的时候,我曾将三个地区特征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进行估计,但它们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对模型的解释力也没有影响。

表 4 对中国农村地区进入农村干部职业类型的离散
时间风险模型估计 (1978 - 1996)

变量	整个改革时期 (1978 - 1996 年)		改革前 10 年 (1978 - 1986 年)		改革后 10 年 (1987 - 1996 年)	
	模型 7a	模型 7b	模型 8a	模型 8b	模型 9a	模型 9b
改革的阶段 (1978 - 1986 年 = 1)	. 448 (. 281)	. 437 (. 282)	— —	— —	— —	— —
性别 (男性 = 1)	1. 253 ** (. 388)	1. 350 *** (. 395)	. 698 + (. 414)	. 791 + (. 421)	NA ^a NA ^a	NA ^a NA ^a
年龄	. 044 (. 098)	. 0160 (. 098)	. 081 (. 120)	. 043 (. 118)	. 198 (. 184)	. 166 (. 188)
年龄平方项	-. 001 (. 001)	-. 001 (. 001)	-. 002 (. 002)	-. 001 (. 002)	-. 003 (. 002)	-. 002 (. 002)
教育程度 (高中或 以上文凭 = 1)	1. 183 *** (. 302)	1. 105 *** (. 309)	1. 329 *** (. 364)	1. 232 ** (. 377)	. 862 + (. 480)	. 837 + (. 491)
党员	2. 495 *** (. 353)	2. 488 *** (. 365)	2. 486 *** (. 449)	2. 421 *** (. 465)	2. 474 *** (. 528)	2. 501 *** (. 539)
旧式精英 家庭背景	—	. 423 (. 449)	—	. 303 (. 637)	—	. 530 (. 647)
新式精英 家庭背景	—	1. 410 *** (. 375)	—	1. 400 ** (. 447)	—	1. 265 * (. 614)
常数项	-9. 253 *** (1. 635)	-9. 120 *** (1. 641)	-8. 692 *** (1. 858)	-8. 416 *** (1. 833)	-10. 86 ** (3. 382)	-10. 50 ** (3. 427)
观察值	2948	2948	2653	2653	2884	2884
事件数	54	54	33	33	21	21
卡方值	134. 55	132. 93	80. 12	91. 30	50. 59	55. 36
Pseudo R ²	. 121	. 138	. 107	. 126	. 097	. 111

说明: 括号里的数字是调整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

+ p < 0. 10, *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01 (双尾检验)。

注: a 由于在这一阶段进入干部职业的只有男性, 所以无法看到性别效应。

影响。

模型 7b 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 我们可以发现, 新式精英家庭的后

代对进入干部职业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改革后成为干部的净风险率是非精英家庭后代的4.1倍($= e^{1.410}$ $p < 0.001$)。对于旧式精英家庭的后代,他们与非精英家庭的后代进入干部职业的机率没有差异(虽然风险系数是正的,但数值很小且没有统计显著性)(见表4)。这些结果与图3所描画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也支持假设3。

分不同历史阶段的模型(模型8a、8b,以及模型9a和9b)显示的模式与模型7a和7b报告的模式高度一致,表明家庭精英背景因素,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因素对进入干部职业的效应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说来,改革以后,由于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连续性,新式精英的后代进入村干部职业有很大的优势,而旧式精英的后代仍没有可能进入农村权力中心。

六、总结与讨论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同时也包括因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就是说,改革后中国农村居民所面临的新的经济机会不仅仅来自市场,还来自新的经济结构。机会结构的多元化造就了通过不同方式获得经济成功的职业群体。本文主要关注农村中经济收入回报较高的三种职业:工资劳动者、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以及农村中的干部。

本研究考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文化——旧式精英文化和新式精英文化——对进入以上三种精英职业类型的影响。旧式精英是指解放前中国农村传统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群体,而新式精英则是再分配经济时期农村中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无论是旧式精英还是新式精英的后代,改革后都更可能成为“赢家”,但是在通向社会上层的道路选择方面,两种精英的后代是有区别的。首先,不管是改革的早期还是后期,新式精英的后代都更可能成为权力精英——进入干部职业群体,而旧式精英的后代于此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这种模式反映了改革后中国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其次,在进入权力精英之外的经济精英职业类型上,两种精英家庭背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用并不相同。在改革的早期,两种精英家庭的后代都选择工资劳动

者作为获得经济利益的途径;而在改革的后期,新、旧精英家庭的后代在道路选择上出现了分野:新式精英的后代依然选择工资劳动者职业类型,而旧式精英的后代则选择了风险较高但回报更大的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数据显示,这种职业类型在农村中的收入是最高的)。

基于这些发现,并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本文提出了“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的观点,以解释不同的精英家庭背景影响中国农民生活机会的经验事实。在理论方面,本研究的发现也验证了文化因素(在微观的层面上)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在宏观的层面上)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及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这也表明,在研究市场转型的时候,制度、结构和文化这三个维度都需要顾及。

本研究的发现对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治理是有借鉴意义的。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正如本研究结果显示的,虽然在道路选择方面有差异,改革之后他们都进入了农村社会的上层,但是他们之间不再是以前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势均力敌。他们之间的合作、竞争或者冲突都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在1996年收集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本文的分析中无法反映出来。例如,随着乡镇企业的逐渐衰退、中国城市经济的急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开始了很大的变化,大批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寻找新的经济机会。这些变化无疑会影响农村中的社会流动模式。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模式,尚需新的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参考文献:

- 边燕杰主编 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 蒋勤 2006,《人民公社时期“钻空式”非农经济与农民谋生理性——以浙东 N 村为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 李猛,1999,《布迪厄》,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欣 2003,《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宋时歌,1998,《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吴晓刚 2006,《“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 - 1996)》,《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08,《1993 - 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与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张乐天 1998,《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Allison, Paul 1982, “Discrete - Time Methods for the Analyses of Event Historie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ed.) by S. Leinhardt.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 Bass.
- 1984,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 Bian, Yanjie &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Blalock, Hubert 1991 *Understanding Social Inequal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Blau, Peter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Blossfeld, Hans-Peter & Gotz Rohwer 2002 *Techniques of Event History Modeling (Second Edition)*.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Bourdieu, P.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ed.) by Jerome Karabel & A. H. Hals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1983,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A. H. Halsey et 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 Peter Robert 1990,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on Socialist Grou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equalities in Hungar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9.
- Gerber, Theodore P. & Michael Hout 1998, “More Shock than Therapy: Market Transiti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Russia, 1991 - 199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 Lareau, Annette & Elliot B. Weininger 2003,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ory and Society* 32.
- Nee, Victor 1989a,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1989b,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China.”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 Europe*, (ed.) by Victor Nee & David Sta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Oi, Jean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óna - Tas, Áko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 Swartz , Davi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zelényi , Iván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reiman , Donald J. (ed.) 1998 *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debook*. Los Angeles , CA: UCLA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 MRDF.
- Walder , Andrew G.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2002a,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 2002b, “Privatization and Elite Mobility: Rural China , 1979 – 1996. ” The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A/PARC) ,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http://SPARC.stanford.edu>).
- 2003, “Elite Opportunities in Transitional Econom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Weber ,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Wu , Yuxiao 2008, “Cultural Capital , the State ,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 1949 – 1996. ”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1.
- Wu , Xiaogang & Yu Xie 2003, “Does Market Pay Off? Earn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Zhou ,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张宛丽

ges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property ownerships , but also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is means China 's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ones. In the eyes of young rural workers, "city life" may also have its specific mean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rural labor researches in a Marxist perspective , then discusses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studies can be one of the other possible ways to examin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bor situation. Based up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of young rural workers and ICTs ,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living ecologies and social meanings of "work" in young workers ' life courses need to be revisited.

Family Origins ,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Elite Reproduction in Rural China , 1978-1996 *Wu Yuxiao* 125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conducted in 1996 , this paper explores determinants of occupational attainments in rural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Specifically , the paper examines how status attainment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origi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with old-elite family origin (political or economic elite familie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pre-liberated era) or new-elite family origin (political or economic elite familie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redistributive period between 1949 and 1978) had been more likely to enter elite occupations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Moreover , although both old and new elite families had advantages , they differed in strategies. People in new-elite families tended to enter wage labor or rural cadre occupations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covered (1978 - 1996) . For those in old-elite families , their choices varied with time : during the earlier stage of reform (1978 - 1986) , they chose to enter wage labor occupations ; while during the later stage (1987 - 1996) , they chose to enter rural entrepreneur or self-employed occupations. To explain this , the paper adopts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proposed by Bourdieu , arguing that elite culture transmitted across generations facilitates economic success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 in rural China.

Social Classes and Civic Dispute Resolutions: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leg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al China
..... *Cheng Jinhua & Wu Xiaogang* 151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5 (CGSS 2005)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civil disputes are distributed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how they respond to those disputes through mobilizing various channels of dispute resolution.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legal mobiliz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citizen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follow different paths to civil justice. Facing civil disputes ,